

·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主题文章 ·

## 现代化进程中统筹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中国经验和理论

裴长洪

**内容提要:**当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既通过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市场和现代化,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回答了这个时代命题,从而使中国的对外开放经验具有了世界性的开创性意义。中国的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相统一是世人公认的事实。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探索自主渐进式开放规律、利用外资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更重视激发内生动力、以开放促进其他国家发展,是这个事实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政治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以实体经济为中心的现代产业体系、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是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启示。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通过实践来实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

**关键词:**对外开放 独立自主 中国式现代化 开创性意义

**作者简介:**裴长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席教授,10002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00836。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4)09-0005-14

###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sup>①</sup>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改革开放是必由之路和鲜明标志,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得到中外人士普遍公认。实行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也是希望实现现代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对外开放究竟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产生了哪些具有世界影响的智慧和方案,这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3—14页。裴长洪电子邮箱:peichhcass739@163.com。

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同时指出,“对外工作必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sup>①</sup>这就是说,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统筹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自诞生起,总是宣扬一种观念:只要打开国门,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落后国家必然发展为发达国家并走向现代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落后国家的现状迫使一些经济学家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进行反思,先后有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中译本,2015)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sup>②</sup>巴西的多斯桑托斯(中译本,1999)提出的“帝国主义与依附”理论。<sup>③</sup>这些理论给落后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即如何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并走本国的发展道路。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普遍认为,试图通过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走向现代化的落后国家,只能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引领和带动下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形成以霸权国家为中心的等级分明的政治经济分工结构。例如,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中译本,2013)于1974年提出了“现代世界体系论”,即少数国家成为核心国,多数国家成为附属国。他的观点折射了西方国家一直以来的历史优越感,但也反映了对这种体系的客观认知和宿命论。这就向后发国家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时代性命题:如何在对外开放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并且能够成功走向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地回答了这个时代命题,从而使中国的对外开放经验具有了特殊的开创性意义,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开放推进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新启示、新思路和新选择。

## 二、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验事实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积极同世界各国开展经济贸易合作。194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sup>④</sup>但是在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大格局中,外部条件不允许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1951年,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实施对中国禁运的决议》,英、法等国投票赞成,并公布对华禁运货单。<sup>⑤</sup>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sup>⑥</sup>因此,当时的新中国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只能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与经贸联系,只能向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开放。但是即使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交往,我们同样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针对世界形势的演变,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进而引导促成了中美建交和中日建交。当时,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有一个中间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② 该理论认为,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可以划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生产结构同质性和多样化的“中心”;二是生产结构异质性和专业化的“外围”。前者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后者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

③ 多斯桑托斯认为,“中心-外围”结构实为“统治-依附”结构,其控制的手段和方式主要有:不平等交换,服务费用吞占,资本输出,通过国际贷款“援助”达到对外围国家的经济控制。此外还有政治、军事手段,特别是通过控制外围国家的统治集团来达到其目的。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41页。

⑤ 引自孙健著《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经济卷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地带,即第二世界发达国家,我们可以先和这些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关系和技术合作。据此,中国先后引进一批化肥、化纤、钢铁生产设备和技术,极大解决了人民的生活需求。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对世界形势作出新的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进而引导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特别是向美国开放,使得中国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方位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先后提出“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sup>①</sup>从而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我国对外开放的历程中不难看出,我们制定对外开放战略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一直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 (二)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驱逐了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收回了外国军事基地的地产和房产,实现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收回了长期被外国霸占的海关管理权,取消了外国资本在金融、航运、保险、商检、公证仲裁等方面的垄断权。根据新中国的外交原则,重新与世界各国商谈建立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实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改革开放早期的1982年,邓小平同志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sup>②</sup>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sup>③</sup>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sup>④</sup>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sup>⑤</sup>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阐述了独立自主的时代内涵,强调独立自主“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sup>⑥</sup>《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sup>⑦</sup>

(三)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对外开放,始终把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一,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投资始终是来自本国的积累和资金。从1978年至今,中国对利用外资始终抱着热忱欢迎的态度,各级政府更是不遗余力、乐此不疲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持续上升,对引进国外技术以及带动国内投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始终有限。根据统计,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在40多年间经历了从逐步上升到逐步下降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1991年,外商直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④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

⑥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⑦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接投资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虽然不断上升,但是占比不超过5%,1992年开始快速上升,从7.51%上升到1994年峰值的17.08%,1994—1997年一直保持在15%左右,此后逐渐下降,到2002年维持在10%左右。2003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进一步下降,2007年下降到5%以下,近十多年来进一步下降到3%以下,只保持在2%左右。

第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从1978年的355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3年的41.76万亿元人民币,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主要依靠内需拉动,而不是依靠人们印象中的“出口导向型”拉动。的确,中国一度出现“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现象,但这个概念的分子是进出口价格总额,分母是国内各产业的增加值总额,分子和分母的经济含义并不对称,它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经济体之间外需重要程度的差别,但不能说明一个经济体内部内外需究竟以哪个为主。现代统计学中的GDP支出法核算是经济学研究用来考察一个经济体内部内外需对经济增长的不同贡献所通常采用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计算,1978—2023年共46年间,国内最终消费支出在绝大部分年份是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其次是资本形成,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当有限,只有13个年份能够达到10%以上,其中,1990年这个特殊年份达到80.5%,在正常年份中,1997年达到峰值42.9%,而不少年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当然,这并不是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不重要,事实上外需对中国的就业、技术进步、参与国际循环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内需仍然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对于任何大型经济体,经济增长最根本的依托和动力都是来自国内因素。即使是外向型或者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外需要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撬动作用,也需要借助于国内要素并与国内要素互动,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内要素市场和消费市场作为依托,对外贸易不可能有强大竞争力,也不可能进一步促发国内更大规模的投资。

第三,贸易盈余占中国GDP比重并不高,中国建设投资并不主要依靠贸易盈余。由对外贸易盈余所产生的经常项目顺差可以转化为贸易盈余国的国内建设资金。从中国货物贸易顺差额的变化来看,中国建设投资主要依靠国内自身储蓄,而不主要依靠贸易盈余。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78—1993年我国货物贸易基本处于逆差状态,1994年以后随着制成品出口竞争力的增强,货物贸易转为顺差,但顺差状态最高的2005—2007年,其占GDP的比重也分别仅为6.48%、7.53%和6.54%,之后一直处于2%~3%。加上我国服务贸易至今仍处于逆差状态,扣除服务贸易逆差后形成的经常项目顺差额实际上更少,占GDP比重更低。实际情况表明,中国并不像一些人们想象的那样主要从贸易盈余中获得建设资金来源。

第四,外商投资企业并不主导中国工业经济整体发展。毋庸讳言,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工业的技术引进、人才培养、管理变革和转型升级,特别是对于出口增长都发挥了历史性促进作用。外商投资企业也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可以激励和鞭策广大内资企业不断发展,持续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加大研发和创新力度。但在庞大的中国工业经济体系中,它仍然是辅助性的,主导中国工业经济的基本盘仍然是中国自身的国有和民营企业。根据中国统计资料,从中国工业总体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在实收资本比重、利润比重和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中始终不占主导地位。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占工业实收总资本比重的峰值为22.89%,2003年其利润比重峰值为22.21%,2004年其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峰值为21.13%,只有在出口贸易中曾出现比重较高的现象,2005年最高达到58.3%。这种现象与我国曾采取的国内市场保护,以及要求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比例和自求外汇平衡有关。随着这些政策的放松,特别是非国有企业进入外贸领域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比重不断下降。从我国外资银行总资产占我国各类存款性公司的比重来看,由于银行业对外资开放较晚且监管较为严格,所以其占比较低,目前仍在5%左右。



第五,始终保持人民币的独立自主地位。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集中体现。在美元霸权的世界货币体系中,能否在扩大开放中坚持本国货币的独立自主地位,是对每个开放国家能否掌握经济主权的风险挑战。在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中国成功实现了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大潮流与坚持人民币独立自主地位的统一。关于一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曾提出过著名的“三元悖论”,<sup>①</sup>即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不可兼得。关于这三者的权衡取舍,在金融全球化浪潮中,很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倡导资本自由流动以及浮动汇率制度。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完善,风险管控能力强,即使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以及汇率浮动,也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货币政策。在西方经济学家的倡导下,很多发展中国家过早地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从而丧失了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也就无法用货币政策来稳定国内经济(刘洪愧,2023)。

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来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及其方式,选择放开资本项目改革的力度和节奏。1996年12月中国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体现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姿态。但同时又采取审慎的态度,在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中不断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实事求是地放松资本项目管制,有步骤地放松境内外资金融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实行的扩大跨境人民币资金的贸易结算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的“自由贸易账户”,都极大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使得中国经济更加具有韧性,能够避免国际经济剧烈波动的干扰,规避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开放中,人民币已经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走向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舞台。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已经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成为IMF第三大股东。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重以及占各国外汇储备的比重也不断攀升。中国的经验事实打破了“三元悖论”,颠覆了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金科玉律”。

#### (四)坚持扩大开放政策与完善国家安全制度的统一性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一方面要求大胆开放,另一方面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他明确指出:“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sup>②</sup>“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sup>③</sup>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国家安全观,保障了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相结合、相统一,贯穿了我国扩大开放的全过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影响国家安全的国内国外因素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加复杂,各种安全风险和挑战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sup>④</sup>因此,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4月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更加全面的国家安全体系。

<sup>①</sup> 加拿大经济学家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和英国经济学家弗莱明(John M. Fleming)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了资本自由流动状况下,政府实施货币政策对固定汇率的影响。1997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通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证分析,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完善为“三元悖论”(Mundellian Trilemma)。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页。

<sup>③</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sup>④</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00页。

### 三、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主要经验

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中国统筹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并不断加以完善。其主要有以下经验。

#### (一)中国式贸易自由化的路径是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

中国式贸易自由化的路径与西方经典国际贸易理论所描述的方式存在本质区别。西方理论一般认为,首先应将配额、外汇控制等非关税手段关税化;然后再不断降低关税水平,从而实现贸易自由化(裴长洪,2008)。但是,中国的国情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存在根本差别,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接近资本主义,其体制基础是市场经济。其贸易自由化的实质是放开本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系的通道,而中国式的贸易自由化首先面临的是国内的计划经济体制如何逐步转为与世界市场能够连接的市场经济体制,其次才是扩大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因此,在走向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中国先是逐步放松高度集中的计划式对外贸易体制。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新体制探索主要围绕扩大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自主权展开。而取代计划管理的是许可证、配额及其他行政控制手段。与计划经济相比,数量控制手段是许多市场经济国家都采用的贸易干预措施。之后,随着国内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国内市场扭曲明显降低,对外贸易数量控制也逐步弱化直至完全取消。

在我国计划体制下,对外贸易领域具有强烈的“反出口倾向”,而鼓励出口的根本性措施是改革外贸企业的体制机制。1993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实践进入了改革计划管理、扩大市场调节阶段;外贸企业从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向建立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的方向转变。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进一步完善了鼓励出口的体制机制。出口鼓励扩大了出口规模,促进了国内产业升级、产品更新换代,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放松对国内市场的保护,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措施。以外贸体制改革为先导,不断为贸易自由化创造条件,这个路径被实践证明是有效和正确的。

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及两者的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随着开放的扩大,促进国内改革的影响和力度也不断增大。首先,它使我们对于世界先进生产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正是认识到与世界生产力水平的差距,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继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其次,对外开放打开了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窗口和机会,增加了中国人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对外开放使中国人更全面地观察世界、更全面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sup>①</sup>这一论断彻底纠正了以往的理论错误,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大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创举。”<sup>②</sup>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 (二)探索出一条渐进式开放的途径和发展规律

邓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智慧给予中国对外开放思路以极大启迪。中国始终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来选择开放的时机、领域、方式、方法、节奏,并不断动态调整以化解各种内外矛盾。这一路径总体上围绕以下三对关系展开:第一是行业(产品)开放与区域开放的关系;第二是对居民开放与对非居民开放的关系;第三是边境开放与边境后开放的关系(裴长洪,2021)。从1980年创办四个经济特区,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再到2013年后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都遵循了渐进式对外开放理念。在初始阶段,三对开放关系中的两者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但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两者不断趋近和融合。中国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基本规律就是不断探索这三对关系趋近和融合的突破口,获得的基本经验是:不断分解矛盾、先易后难,摸着石头过河,再通过顶层设计以特殊政策突破体制机制束缚,从而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不断开辟道路(裴长洪,2020)。

## (三)利用外资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严格控制外债规模

在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上,邓小平同志敏锐洞察到利用外资是一个关键问题。1979年在讨论经济工作时他提出利用外资是一个大政策的判断。<sup>①</sup>同时,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都反复地强调和说明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sup>②</sup>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第一部外商投资企业法,<sup>③</sup>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大规模利用外资应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这样才能发展实体经济和增加就业,并避免国际收支不平衡。继1979年7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出台后,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外资企业法》,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共同组成了利用外资的三部基本法律(统称“外资三法”)。这些基础性的制度变革,为中国大规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法治条件。

20世纪80年代初期,外商直接投资主要进入非工业领域。1984—1988年5年间,大约仅有45%的外商投资协议金额投向工业部门,到90年代初期外商投资的工业项目已占支配地位。1991年,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项目12978个,其中工业类项目达11632个,占总项目数的89.6%。可见,到90年代初期,工业部门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已占主要地位。中国的利用外资政策保障了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特别是制造业的换代升级和改造提升,大幅度增加了城乡居民就业,提高了人民收入和福祉。

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问题上,与中国的政策不同,不是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主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而是热衷于利用外国和国际组织贷款,以债务解决财政和货币问题。例如,印度独立后,向美国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申请大量贷款,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债权人,并以贷款控制印度经济,不仅贷款附带条件,而且大部分贷款必须用于购买美国商品。由于印度缺乏自身经济独立性,美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无所顾忌,总是选择印度基础最薄弱、但利润最高的部门投资,例如美国对印度石油加工业的投资,有关报道披露其利润高达60%,而有些人认为实际利润比这个比例还要高4~6倍。<sup>④</sup>这种依赖外资的政策,是印度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始终难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原文是:“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65、79、91、98、99、106、110、117、130、138、149、165、171、193、286、308、313、365、373页。

③ 这里指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④ 1951年6月美国政府给予印度1.9亿美元贷款在美国采购粮食,但附有许多要求,而且大部分贷款必须用于购买美国商品。如印度必须供应美国所缺少的战略资源。从1949年到1956年6月,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总共给予印度政府贷款2.147亿美元,年利率不仅高达3.5%~4%,而且大部分贷款必须用于购买美国商品。1952年印度与美国合资设立印-美基金,用于印度建设的资金支持,在此后五年间,美国给印度的拨款总额为3.268亿美元,其中2.98亿美元是为实现规定的各项措施而自美国所运来的货物的价款。引自[苏]巴拉布舍维奇·季雅科夫主编《印度现代史》(下册),北京编译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770—772、774—776页。



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些拉美国家也曾大规模举借外债,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财政困难,但是外债规模超出了本国的偿还能力,不仅影响了国内经济发展,甚至最终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sup>①</sup>

在改革开放早期阶段,中国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和国际组织的低息贷款,但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对举借外债进行了规范管理,到1987年形成了外债统计监测体系(EDSS),可以及时地了解 and 掌握全国的外债规模、币种、期限和偿付等情况,并始终将外债规模控制在安全警戒线以内。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债余额规模始终小于500亿美元,90年代基本控制在1500亿美元之内,只有到2003年以后,随着我国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长,外债余额规模才出现较大幅度增长(裴长洪,2008)。

(四)发展对外贸易,既发挥外资企业的作用,更重视激发本国内在动力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由中央的少数国有企业运营的,处于高度集中垄断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外贸经营管理权下放,大量地方国有企业进入外贸领域,加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很快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生力军。其快速增长导致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攀升,2005年达到历史峰值,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8.5%,占中国出口贸易比重的58.3%。<sup>②</sup>2004年我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其最大的亮点是放开了对国内企业和自然人的外贸经营权,并把外贸经营从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这一改革极大调动了非国有企业参与外贸经营的积极性,使非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外贸的另一支生力军,并迅速超过外商投资企业。

除了全面放开对外贸易的经营权,2005年中国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自此,民营企业开始积极开发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并逐渐成为外贸经营第一大主体,其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稳步提高。根据海关统计,2019年我国非国有企业成为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占货物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上升到42.28%,外商投资企业降为第二,所占比重下降为39.86%,2021年前者比重再上升到48.28%,后者再下降到35.89%。在出口贸易占比方面,我国非国有企业占比更高,2015年就已经超过外商投资企业,占比达到45.1%,此后不断攀升,2021年达到57.73%,而外商投资企业占比则从2015年的44.2%下降到2021年的34.27%。

(五)立己达人是统筹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

中国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不仅要从开放中得到国际经验和世界市场的利益,同时也秉持立己达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以开放促进其他国家发展,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月就提出要“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sup>③</sup>近年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阻碍全球化深入推进、提出所谓的“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供应链本土化”的背景下,中国坚定地支持和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1979—2012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年均贡献率已经达到15.9%,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sup>④</sup>2013—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根据

<sup>①</sup> 1981年拉美的外债总额已超过2777亿美元,仅公共债务就达1500亿美元,比1970年增加了8倍多。据泛美银行公布的数字,仅1966—1987年,拉美债务国所支出的利息就高达1857亿美元,80年代拉美债务国偿付外债的利息要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4%。引自[美]罗伯特·德夫林著《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供给侧的故事》,张月、徐轲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sup>②</sup> 有关中国对外贸易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

<sup>③</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37页。

<sup>④</sup> 参见国家统计局报告:《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三》。



《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631.2亿美元,为全球第二位,并连续11年位居全球前三。2022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75万亿美元,连续六年位居全球前三。我国对外投资范围遍及全球189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4.5万家。<sup>①</sup>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倡议的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前者开创了新的国际贸易分工模式,吸引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生产分工,成为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后者吸引了更多发展中国家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共建“一带一路”也开辟了新的亚欧大陆运输通道,即“中欧班列”,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使得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更加紧密。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和产品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国且连续四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退而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中国进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也加快在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非洲等国家投资建设了一大批产业园区,并以此带动大量中小企业批量化抱团走出去,逐步构建出以中国出口关键中间产品、其他国家进行加工组装的区域内价值链,极大促进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

#### 四、中国统筹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基本理论

(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政治主体是保证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统一的政治前提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特征。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以及由此伴随的对外开放的政治前提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有的。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如亚、非、拉美许多国家,它们在摆脱殖民统治和取得民族独立以后,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但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基本保留和延续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旧架构。在政治上采取多党轮流坐庄的所谓“民主”制度,意识形态全盘西化;其政治体制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主体。缺乏坚强政治主体引导的社会,往往很容易蜕变为民粹主义,导致内耗不断加剧,国内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大,更难以应对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垄断资本的冲击,始终形不成国内发展的合力。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苏联和东欧转型经济体则废除了共产党领导,全盘采用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在经济上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废除了公有制经济,结果引起了社会混乱和经济衰退。在打开国门后,原有的经济秩序被破坏,人民的财富被肢解侵吞。历史教训说明,如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主体和领导核心来整合国内各种力量,那么就很难在对外开放中实现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是历经磨难得出的结论。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世界寻找真理,因为它们成功建成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国家。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sup>②</sup>新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与多数发展中

<sup>①</sup> 参见国家统计局报告:《高水平开放成效显著 合作共赢展现大国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1480页。

国家不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实践。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sup>①</sup>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砸烂了旧的国家机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立和不断完善新的国家机器和上层建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治前提是中国能够在对外开放中,在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中,从不丧失自我,始终保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最重要的经验。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般通过和平请愿活动与西方宗主国达成妥协,以保留殖民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特权和社会结构为代价换取民族独立,试图在西方继续控制下用旧的国家机器实现本国的现代化。尽管这种方式备受美西方的赞赏和追捧,但西方国家从来就没有真心帮助它们实现现代化,反而是不断强化对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统一的深厚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不同的。在经济上,美欧等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发起过针对外国企业的“国有化”运动,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仍然主要是私有制。在所有私人财产中,资本家拥有最主要的私人财产权。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分配制度,资本成为最大的经济受益者,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被剥削。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运行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同时可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基本经济制度保证了非公有制经济和外资经济可以融入社会主义经济,成为它的组成部分,而不可能成为侵蚀、损害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力量。而且,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与很多国家不同,它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是十分重要的。西方国家崇拜自由市场经济,以资本收益最大化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其所服务的中心不是资本,而只能是人民。因此,中国的有为政府既包括弥补市场失灵,也包括规划经济发展蓝图并调控和管理经济活动。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始终沿着开放与独立自主统一的道路健康发展,除了基本经济制度,还离不开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sup>②</sup>它的五个根本制度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共建共治共享;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除上面提及的基本经济制度外,还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重要制度指在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指导下,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主体性制度,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法治体系、党的建设制度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仅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底色,还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即文化和社会的民族性和先进性。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维护私有制、鼓吹个人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以及西式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理念,提倡人权大于主权的世界观,哲学上推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外思想方面践行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理念(裴长洪,2023)。中国构建的社会文化制度体系,保障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安全,对于吸收外来先进有益的成分,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保持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促进了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健康发展。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sup>②</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5页。

(三)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产业体系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经济基础

新中国前30年,中国就已经基本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即重工业发展得更快,为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为对外开放初期发挥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加快轻工业和消费资料工业发展提供了经济的外部性,从而使中国产品迅速进入世界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在获得资本积累的基础上,进而有序地发展机械制造、重化工、交通运输等重工业。因此,虽然中国融入了全球生产体系,但仍然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新进展,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0年开始,中国就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到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几乎是美国和日本之和。<sup>①</sup>而且,中国不仅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服务业、金融业和农业也取得了显著发展(裴长洪,2023)。在制造业基础上,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已经在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等行业积累出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出口额持续增长。这使得我国更多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吸引国际资源要素,从而形成独立自主开展对外经贸关系的深厚基础。

这与一些小型经济体以及一些发展中大型经济体有很大区别。例如,同样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其在独立初期也想发展民族工业,但是国内经济、社会和上层建筑存在各种制约因素,始终没有形成健全的本国工业体系,农业和服务业的占比一直很高,制造业占比始终比较低。印度2020年第二产业仅占到GDP的24.53%,而农业和服务业分别占GDP的18.23%和57.23%左右。<sup>②</sup>其现有工业生产体系也很不健全,制造业在过去20年中几乎没有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严重的短板,在机械制造、重化工业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而且缺乏完整的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从就业来看,印度农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60%左右,其次是服务业,最后才是工业。印度虽然在某些产业如软件服务业以及制药行业方面有较强竞争力,但也基本依靠国际跨国公司的分工安排。印度在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去工业化”了,所以只能依附于美西方国家。

独立的产业体系、完整的产业链、大规模的市场容量、较大的人口规模和消费市场、自主的产业发展规划,使我国始终可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同时稳步扩大参与国际循环的能力,提高参与国际循环的经济比重,这与新加坡等小型经济体也完全不同。新加坡外贸总额与GDP的比率达到200%以上,高度依赖美国、中国、日本、欧洲和周边国家的市场。同时,其发展依赖于地理位置方面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发展贸易、港口、航运、金融、石油化工行业,但是这些行业都是服务于国外企业和行业,而不是主要服务于国内产业,其市场都在国外,更多依赖于国际循环是否畅通。这决定了这些小型经济体的现代化模式只能是西方模式的翻版和辐射。而中国的发展更多是内源式的,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和资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高端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都是服务于国内制造业和国内市场的,这就决定中国利用开放可以走出一条与美西方国家现代化完全不同的道路。

(四)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抵御世界经济风险的“防火墙”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法律、规章制度、体制和政策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在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过程中,中国对外经贸的

①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另外,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中数据计算得出: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为27.4%,美国为16.8%,日本为7.5%,德国为5.4%,其余经济体占42.9%,<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

② 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中数据计算得出,<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



规则、制度、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开辟了构建和完善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进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生深度调整,全球经济治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同时也给中国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在开放型经济领域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党的上述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在制度建设中创造了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完善的经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有关部门,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政府各部门制定修改相关法规和部门规章,如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境外投资管理办法》,2019年制定出台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这种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建设的完善,既离不开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导,更离不开开放型经济具体实践活动的校正和补充。

在构建和完善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过程中,基于40多年长期实践的认识,始终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治理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治理制度约束,坚持问题导向的渐进式开放的治理路径选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动力源泉,从而保障了中国能够实行独立自主的经济治理方针,而不需要依附任何外国。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针,以及在处理涉外经济事务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性,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秉持的、毫不动摇的建设理念。中国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也同样需要坚持独立自主性,这才能保证在与国际规则接轨中不丧失自我,保证对我有利、互利共赢;才能保证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既接受民主、协商、合理的理念和规则,又有理、有力、有节地开展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斗争,在斗争中求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但由制度优势和治理体系所构筑的“防火墙”使中国在应对“输入型”经济危机中表现出强劲韧性和抵抗力,从而能够把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已经被1997年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和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史所证明。世界各国在建立自己的开放型经济治理架构中,防范风险、保障自身经济金融安全都是治理的重要内容,但它们所依赖的手段都往往只有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措施,例如财政、货币和外汇政策等。而中国以制度、规则、规制和管理为基本架构的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向全世界希望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选择、启发了新思路。

## 五、结 论

对外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成功地把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自信自立、自力更生统一了起来,这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的一般性规律在于,“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同时“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sup>①</sup>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的智慧和方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选择和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启示和借鉴。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18页。



参考文献:

1. [阿根廷]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苏振兴、袁兴昌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2. [巴西]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郭方、刘新城、张文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4. 刘洪愧:《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分析与经验总结》,《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5. 裴长洪:《我国利用外资30年经验总结与前瞻》,《财贸经济》2008年第11期。
6. 裴长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实践进展与理论认识》,《国际贸易》2020年第12期。
7. 裴长洪:《融合世界一切先进事物 推进人类共命运——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开放观》,《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6期。
8. 裴长洪:《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内涵》,《经济纵横》2023年第4期。

## China's Experience and Theory of Maintaining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While Opening up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PEI Changho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00029;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0836)

**Summary:** The common problem which contemporary developing countries face is how to move toward the world market and modernization through opening up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independe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fers such a successful model that China's experience of opening up has the groundbreaking significance in the world. In China's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reform and opening-up are the inevitable choice and its distinctive symbol, and how to open up and integrate in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re also the common problems facing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on their way to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it's worth research that what wisdom and solutions with global impact China's opening up has produced. In this regard,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sup>th</sup> CPC Central Committee pointed out clearly that "opening up is a defining fe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 must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basic state 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reform through opening up", and that "in foreign relations, China remains firmly committed to pursuing an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of peace". This mean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developing countries must maintain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while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main features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clude the domestic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exploration of the law of independent and gradual opening up, th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mainly in the form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with more emphasis on stimulating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The strong political bod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centered on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open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re the theoretical revelations of China's open economy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basic point through all is China's issues must start from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it is up to the Chinese themselves to realize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through practi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hina has been actively work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 economy and trade, and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t has rapidly integrated into global economic system, entering a new stage of opening up. Since the 18<sup>th</sup>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has raised the level of its open economy in all aspects, successively putting forwar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building a new open economic system at a higher level,” so that raising the level of opening up to a new height. In this process, China has safeguarded its national sovereignty, independently formulated its foreign policy, opposed hegemony, and safeguarded world peace. Economically, China has independently explored development paths and formul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pened up on the basis of self-reliance, and has always kept the economic lifelines in its own hands. First, the main investment in Chinese economy has always come from its own accumulation and capital. Second, external dem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mploymen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but domestic demand remains the most fundamental factor influencing economic growth. Third, trade surplus doesn’t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China’s GDP, and trade surplus is not the primary source of China’s investment. Fourth,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y are still auxiliary in China’s huge industrial economic system, and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is still dominated by homegrown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Fifth, China has always adhered to an independent and self-reliable monetary policy, and has advanced the RMB exchange rate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ixth, China has insisted on expanding opening up while improving it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While opening more sectors up, China has maintained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and has gradually formed an ever-improving open eco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lessons learned are as below: the Chinese path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s that reform and opening up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it’s necessary to explore a path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progressive opening up. Th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mainly come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control on the scale of foreign debt is 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need not only the role of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but also the cultivation of domestic demand;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e benefit to China and its trading partners while ensuring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In this process, China has formed the basic theory of maintaining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while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strong political bod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the political prerequisite;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the distinct hallmark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profound founda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opening up and 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 the industrial system centering on the real economy is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which the domestic economy is the mainstay and mutually reinforce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open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re the firewall against the risks of the world economy.

Opening up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ch has successfully unified opening up and independence, self-confidence and self-reliance, creating a new model for human advancement and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is the wisdom and solutions that the CPC and Chinese people propose for solving the common problems facing mankind, and it i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choosing and exploring their path of moderniz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Keywords:** Opening Up, Independent, Chinese Modernization, Groundbreaking Significance

**JEL:** F1

责任编辑:原 宏